

# 论唐五代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体制

杜文玉

**摘要:**唐五代时期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除了御史台派御史和皇帝临时遣使分巡各地外,各级地方政府内部亦置有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员,其中在藩镇使府中置有节度判官或观察判官,合称两使判官,此外还置有孔目官,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内部监察体制。两者的分工是:两使判官主要负责监察事务,孔目官主要负责文案的勾稽,从而达到对政务监察的目的。

**关键词:**唐五代;藩镇;监察体制;两使判官;孔目官;勾检制

关于唐五代的监察制度研究成果颇丰,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有所涉及,但大都论述的是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对地方政府内部的监察体制则很少涉及,有关藩镇使府内部监察体制的研究尤为稀见。研究唐代地方职官制度的论著,虽对某些职官的监察职能有所涉及,但由于论述的角度不同,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sup>①</sup>。

## 一、两使判官的设置与选任

关于唐前期的地方监察制度,何汝泉已有过详尽的研究,然而只是从御史台派员巡按和皇帝临时派遣采访使、巡察使、黜陟使、按察使等使职分巡各地,以监察地方官员的角度进行论述的,体现的还是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宁欣所论述的是财政系统的巡院官员带御史衔者,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作用,说到底仍然是中央对地方监察的一种体现(出处均见注<sup>①</sup>)。其实在唐五代始终都存在着一套针对各级地方政府而确立的内部监察体制,这一体制既与勾检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又有着明显的差别。勾检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付)事发展,二是勾检稽失,三是省署钞目<sup>②</sup>。主要是针对各级官府在公文收发以及处理方面而制定的一套程序性的制度,尤其侧重于财政方面的审计。其所具有的监察方面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可以提高各级官员的办事效率,避免或减少失误,此外对官员的权力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便于对失职官员责任的追究。勾检制与监察制度之间的关系还表现在,在地方政府中有些负责勾检的官员往往同时也负有监察之责。有人说勾检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只是唐代行政制度的一个子系统<sup>③</sup>。更准确地说,其应该是监察制度的一个子系统。关于勾检制学界已有不少的研究,本文主要针对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机制(包括勾检制)问题进行探讨。

**作者简介:**杜文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时期职官管理制度研究”(12BZS03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研究唐代地方官制的论著主要有:严耕望:《唐代州府僚佐考》,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唐代中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2008年;张玉兴:《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夏炎:《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研究唐代地方监察制度的成果有:何汝泉:《唐代前期的地方监察制度》,《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宁欣:《唐代巡院及其在唐后期监察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胡宝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地方监察制度。

② 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③ 李志刚:《唐代勾检制度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1-32页。

有关唐代藩镇使府中负责监察的职官设置情况,各种政书均未有明确记载,《新唐书·百官志》和《旧唐书·职官志》虽然记载了节度与观察使府有判官的设置,却未明确记载其职能情况,这是学界长期以来对此问题没有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综合各种典籍以及碑石资料的记载,使我们得以知悉在这一级政府中负有此责的是判官和孔目官,其中尤以前者最为重要。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唐五代凡充使事繁者,多置判官以为助手,此外,设在地方的防御使、团练使等,其下也皆置有判官,这些都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这里所谓判官,是指节度判官和观察判官,合称两使判官。

两使判官在使府中地位颇高,地位仅次于副使,但实际权力却高于副使。胡三省说:“唐诸使之属,判官位次副使,尽总府事。又节度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而未有代,皆有知留后事,其后遂以节度留后为称。”<sup>①</sup>又说:“判官,幕府右职也。”<sup>②</sup>李光弼出镇徐州时,“惟军旅之事自决之,自余众务,悉委判官张修。……诸将事修如光弼,由是军中肃然,东夏以宁”。田神功任兖郛节度使时,“留前使判官刘位等于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见光弼与修抗礼,乃大惊,遍拜位等曰:‘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礼仪,诸君亦胡为不言,成神功之过乎!’”<sup>③</sup>可见节度判官地位之高。类似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如孔戣在郑滑节度使卢群手下任判官,“群卒,摄总留务”<sup>④</sup>。再比如“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知留后事”<sup>⑤</sup>。这说明节度副使名为副职,实则无权,其实际地位不要说与判官比,即使行军司马也比其权重。

两使判官在知留后事时,自然要全面掌管使府军政,在通常情况下,其主要职责是协助长官处理军政事务,史载节度使府置“判官二人,分判仓、兵、骑、胄四曹事”<sup>⑥</sup>。实际上判官所管事务十分繁杂,如淳于晏“及历数镇皆为判官,军府之事,咸取决焉。至于私门簿籍,婢仆支分,事无巨细,但取决于晏”<sup>⑦</sup>。除了这些事务外,其重要的职责就是勾检与监察。先简要谈一谈其勾检职能,据《唐会要》卷五十八《左右司郎中》:“按《公式令》:应受事,据文案大小,道路远近,皆有程期。如或稽违,日短少差,加罪。今请程式,常务计违一月以上,要务违十五日以上不报,按典请决二十,判官请夺见给一季料钱。”

前已论及,勾检制的内容之一就是受(付)事发展,即收到上级或者其他部门转来的公文,要登记清楚接收的日期,何日将公文交付何人处理,都要及时登记,作为计算程限、检查是否按时处理完公文的依据。如果超过一定的期限,就要对判官进行处罚。上引同书还载:“其急要文牒,请付当道进奏院,付送本使。委观察使判官一人,发遣送州,取领具月日先报。常务请依常式。”这是指中央下发给地方政府的紧急公文,通过本道设在京师的进奏院,送付本道长官(即所谓“本使”),再由观察判官负责转发给下属诸州政府。非紧急公文(常务)则按《公式令》规定的程序执行。

两使判官还负有财务审计之责,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四月,“比部状称:天下诸州及军府赴句帐等格,每日诸色句征,令所由长官、录事参军、本判官,据案状子细句会”,又引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8)六月十五日敕曰:“诸州府请委当道观察判官一人,每年专按覆讫,准限比部者。”<sup>⑧</sup>地方政府每年向比部呈报勾征账目,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财务审计,而使府负责此事的就是判官和孔目官<sup>⑨</sup>。至于勾征与勾稽的区别,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sup>⑩</sup>,兹不赘述。关于两使判官掌管受(付)事发展之事,还

①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六载十二月”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88页。

②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唐僖宗光启二年正月”胡三省注,第8330页。

③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肃宗宝应元年建巳月”,第7128页。

④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三《孔巢父传》附《孔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08页。

⑤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德宗贞元八年三月”,第7527页。

⑥ 杜佑:《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典·都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95页。

⑦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七二五《幕府部·尽忠》,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631页。

⑧ 王溥:《唐会要》卷五十九《比部员外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18页。

⑨ 关于孔目官负责勾稽文案的记载,多见于出土文书,其研究情况参见钱伯泉:《“唐建中伍年孔目司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⑩ 薄小莹、马小红:《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尉判集研究——兼论唐代勾征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15—649页。

有更加明确的史料记载,据李商隐《樊南乙集序》载:“故事,军中移易牒刺,皆不关决记室,判官专掌之。”<sup>①</sup>文中所谓记室,指记室参军,掌书檄表奏的起草,而公文的接收和发出,则由判官负责,与记室参军无关。由于勾检非判官主要职责,亦不赘述。

关于两使判官的设置,《旧唐书·职官志》记节度判官置二人,而《新唐书·百官志》却记载说两使判官各置一人。其实两书所记并不矛盾,后一书所记的是大历以来的情况。如此之少的职数,如何能应付前述的繁重事务呢?其实在唐后期其职数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至唐宣宗大中时期达到了五六人之多<sup>②</sup>。其具体选任情况是:由于两使判官亦属于幕职官,故“未见品秩”<sup>③</sup>。幕职官通常多由长官辟置,可是判官、副使、行军司马等,却大都由朝廷选任,最起码也是长官奏请朝廷同意后再任命的,显示出其不同于一般幕职官的特点。由于幕职官没有品秩的规定,其品秩高低以其所带的检校、试官衔决定。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十二月制:“今后使府判官、副使、行军已下,使罢后,如是检校试五品以上官,不合集于吏部选,任准罢使郎官、御史例,冬季闻奏。”<sup>④</sup>唐制,六品以下官由吏部铨选,五品以上由宰相或皇帝选任,而检校、试官不在此列,故以上规定是对这几种幕职官选任高度重视的一种表现。到了五代时期干脆将其全部改由朝廷选任,而不再管品秩高下。如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规定: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已下,任满前一个月,“本处闻奏,朝廷选替补授”。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又改为“今后朝廷只除两使判官,其书记以下,任藩府自辟”。后唐末帝清泰三年又规定:“应两使判官、畿赤令长,取郎中、员外、补阙、拾遗、三丞、五博、少列官僚,选择擢任。”<sup>⑤</sup>直到后汉时期,仍然强调:“其诸道行军、副使、两使判官,并不得奏荐,委中书门下选除。”<sup>⑥</sup>说明朝廷对两使判官的选任越来越重视。

唐代两使判官的选任还有一个特点,即多带御史衔,或是检校,或是试官、摄官。如韦雍“张弘靖镇幽州日,奏授观察判官,摄监察御史”<sup>⑦</sup>,李卿材“遂以观察判官辟。奏授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孔某“表署观察判官,假监察御史”,高彬“奏授观察判官,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sup>⑧</sup>。类似史料在史籍及墓志中甚多。甚至还有从御史中直接选任为两使判官的现象,如崔郢为监察御史,唐文宗开成(836—840)中改“为侍御史,充鄜坊节度使判官”<sup>⑨</sup>;李景业“以监察里行为观察判官”<sup>⑩</sup>;宗羲仲“授大理少卿兼监察御史,仍充节度判官”<sup>⑪</sup>;卢冀“以明识利器为侍御史、泾原节度判官”<sup>⑫</sup>。这一现象在唐代颇为常见,以至于“长庆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诸道节度观察等使,请在台御史充判官。’”<sup>⑬</sup>为什么要在御史中选任两使判官呢?当然与其属于监察性质的职官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因如此,许多两使判官任满后,又到御史台任职,这样的事例太多,试举几例:牛仙客任朔方节度使时,以姚闾为判官,他升任宰相后,姚闾也迁为侍御史<sup>⑭</sup>。李愬“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廪业、宇文顺、于儒

① 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七〇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645页。

②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今诸道观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7页。

③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第1923页。

④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第378页。

⑤ 以上均见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第7588、7596、7597页。

⑥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三四《铨选部·条制六》,第7603页。

⑦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三《列女传》,第5150页。

⑧ 分别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62,第1081页;《唐故陇西李府君(字卿材)墓志》,咸通100,第1112页;《唐故左拾遗鲁国孔府君墓志铭》,乾符014《高彬墓志铭》,第11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⑨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五二一《宪官部·不称》,第6223页。

⑩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七五五杜牧《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471页。

⑪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四三九豆卢瑑《岭南节度判官宗公神道碑》,第1984页。

⑫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26《卢方墓志铭》,第901页。

⑬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五一六《宪官部·振举》,第6169页。

⑭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〇三《牛仙客传》,第3197页。

卿、李宙及愷为判官,摄监察御史……以课并迁监察御史”<sup>①</sup>。杨收、杨严兄弟同在西川任职,“兄弟同幕,为两使判官,时人荣之。俄而(杨)假自浙西观察判官入为监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为监察。兄弟并居宪府,特为新例”<sup>②</sup>。杨假与杨收亦是兄弟关系。孙简“授监察御史里行,充镇国军判官,征为监察御史”,崔慎由“兼殿中侍御史、义成军节度判官,复入台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sup>③</sup>。两使判官多入台任御史,是因为其本来就属于监察性质的官员,业务熟悉,自然是御史台选任官员时的首选。

不过,这一切都是唐后期变化的结果,并非始终如一,如“天宝二年八月七日敕:所置御史,职在弹违,杂充判官,诚非允当。其诸道节度使先取御史充判官者,并停。自今已后,更不得奏。若切须奏者,不得占台中缺”<sup>④</sup>。说明在此之前就已存在以御史充任两使判官的现象,此次虽然禁止再以御史杂充判官,但却没有把路堵死,如果确实需要,可另行奏请,授予检校官或试官,就无须再占御史台的员额了。上述牛僧孺奏请在台御史充任判官的行为,说明唐后期地方吏治已非天宝时期可比,强化对地方吏治的监察已是势在必行了。

## 二、两使判官的监察职能

关于两使判官所负的监察之责,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负有监察吏治之责。如唐文宗太和七年(833)七月规定:诸州刺史任满离职一个月后,由本州上佐和录事参事将其功过行能调查清楚,“各具事实申本道观察使,简勘得实,具以事条录奏,不得更为文饰,其文状仍与观察判官连署”。如有不实,“观察判官、分巡院及知州上佐等,并停见任,一二年不得叙用”<sup>⑤</sup>。为什么要判官与观察使共同在文状上署名呢?原因就在于其负有监察之责,如文状内容不实,就要受到处罚。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十一月诏曰:刺史如有违法行为,“本判官不能规正”,“并量加贬降”<sup>⑥</sup>。唐懿宗时敕曰:刺史施政不力,“如藩方不谨察廉,或致下人上诉,推覆得实,观察使别候敕旨,本判官远加谴罚”<sup>⑦</sup>。唐僖宗也颁布过类似的诏敕:刺史、县令“如或贪残不理,害我疲人,委中书门下重加惩殿,仍令诸道长吏、观察判官切加察访,每岁具善恶奏闻”<sup>⑧</sup>。直到五代时期判官的这一职责仍然没有变化,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由于诸道解送的参加神童科考试的童子,或年龄过大,或“道字颇多讹舛”,于是规定地方政府今后如考查不严,滥发解文,“其逐处判官及试官并加责罚”<sup>⑨</sup>。处罚试官是因其没有尽到严格考试之责,至于处罚判官,则是其没有尽到监察之责。在这一时期因为判官等未尽监察责任而被处罚的例子也是有的,如孟昇隐瞒其母之丧,于孝道有亏,后唐明宗赐其自尽,“观察使、观察判官、录事参军,失其纠察,各有殿罚”<sup>⑩</sup>。

唐前期实行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刺史有事可以直接上奏朝廷。唐后期实行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为了适应这种体制,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二月,中书门下奏:“诸州刺史到郡,有条流,须先申观察使,与本判官商量利害,皎然分明,即许施行。……敕旨:依奏。”<sup>⑪</sup>其实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专奏事的情况了,此次不过是对这一体制再次确认罢了。支郡有事申报观察使,体现的是以上对下的领导体制,观察使接报后与判官商量,除了因判官分判诸曹,掌管具体政务

①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七下《李愬传》,第4888页。

②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第4598页。

③ 分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宝历010《孙简墓志铭》,第876页;咸通053《清河崔府君(慎由)墓志》,第1075页。

④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二《御史台下·杂录》,第1280页。

⑤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三六《铨选部·考课二》,第7629—7630页。

⑥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五五《帝王部·督吏》,第1879页。

⑦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六唐懿宗《咸通七年大赦》,北京: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444页。

⑧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六唐僖宗《光启三年七月德音》,第448页。

⑨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四一《贡举部·条制三》,第7692页。

⑩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一〇九后唐明宗《赐孟昇自尽敕》,第489页。

⑪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九《刺史下》,第1432页。

外,还有一点就是体现了其所负的监察之责,便于随时履行这方面的职责。

在地方官员的迁转与铨选方面,判官亦负有把关的责任,主要体现在推荐人选与档案资料的审查把关上。如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十二月规定:在这一年的选人中,“其中有文词博赡、学术精通、灼然为众所知,亦任于所在州府程状本州长官,精加选择,堪奖拔者,具解由送,依例赴集。至省审核,有才实相副,别状送名。如有渝滥,其本州署申解牒本判官,量事科罚”<sup>①</sup>。再如唐武宗会昌六年(846)五月制曰:“县令员数至广,朝廷难悉谙知,吏部三铨只凭资考,访于近日多不得人。委观察使于前资摄官内,精加选择,当具荐论。如后犯赃,连坐所举人及判官,重加惩戒。”<sup>②</sup>以上这些事例都属于推荐人选,以便于吏部从中选拔优秀人才,然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如荐非其人,则要对判官进行处罚,其原因就在于其负有监察与审核的责任。唐朝后期由于战乱与社会动荡,“三库敕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诈欺”,甚至有将档案“改张毁裂”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贞元四年(788),吏部奏请:“谨具由历状样如前。伏望委诸州府县,于界内应有出身以上,便令依样通状。限敕牒到一月内毕,务令尽出,不得遗漏。其敕令度支急递送付州府,州司待纳状毕,以州印印状尾,表缝相连,星夜送观察使。使司定判官一人,专使勾当都封印,差官给驿递驴送省。……敕旨:依奏。”<sup>③</sup>所谓“由历状样”,“由”是指“解由”,是官员任满时发给的一种文书,上书任满年月等内容;所谓“历”,指“历子”,是官员赴任时,吏部签发并加盖印章的公文,注明应到任的年月等内容;所谓“状”应是指考状,也叫考牒,即历次考课的记录。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由吏部颁下这些文书档案的标准样式,由各级地方政府依样补充或核实此类档案,然后密封报送到使府,再指定判官一人汇总审核,盖印密封后差官报送吏部。此类事务之所以仍由判官负责,与其所负的勾稽和监印之责是分不开的。

其二,负有考课下属官吏之责。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五月敕曰:“诸使府……官吏考课,合是观察判官专判。”<sup>④</sup>其实后唐的这一规定沿袭的就是唐制,试举一例:阳城在唐德宗时任道州刺史,勤政爱民,由于道州土瘠民贫,阳城不愿加重百姓负担,以至于“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诘让”。年终考课时,阳城“自署其第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派判官核查,到了道州后,阳城却将自己关在监狱,其下属官吏曰:“刺史闻判官来,以为有罪,自囚于狱,不敢出。”<sup>⑤</sup>观察使又派别的判官来核查,感于其爱民心切,遂不了了之。吏部考功司是主管全国官员考课的机构,在藩镇使府中与其发生工作关系的就是判官。这一点可以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考功司的上奏中得到证实,其原文如下:“外官应申考解,先无限约,请自今以后,限十一月十五日到省毕。如违本牒,使罚本判官决本典。”<sup>⑥</sup>考解是每年考课结束后,地方政府上报当地考课结果的公文。在唐前期本来规定有上报考功司的时间,可能是唐后期长期没有认真执行,故考功司才重新奏请以每年的十一月十五日为止。所谓“到省毕”,是指报送到尚书省,这是由于吏部隶属于尚书省之故。按照唐制,各级政府的考课之事均由其长官主持进行,实际上各级长官只是负领导之责,在使府中具体工作是由判官负责的,上面引文所说的“观察判官专判”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到期不能将考解送达京师,则要处罚判官。

自贞元、元和以来,皇帝多次颁诏,加强对刺史、县令的监察考核。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根据其考课成绩分为三个等级,“其(指县令)在第一等,委中书门下及吏曹优与处分;第二等依资改转;第三等量加降黜。其受替后,委刺史、录事参军比验等第,申观察使与观察判官勘验,诣实申奏。……其刺史,委观察使判官具考课闻奏”<sup>⑦</sup>。引文中的录事参军,指州录事参军,观察使判官指观察判官,

①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三〇《铨选部·条制二》,第7558页。

②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第7578页。

③ 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四《选部上》,第1588页。

④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三六《铨选部·考课二》,第7635页。

⑤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二《阳城传》,第5133—5134页。

⑥ 王溥:《唐会要》卷五十八《考功郎中》,第1184页。

⑦ 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四三〇《大中元年正月十七日敕文》,第2178—2179页。

前者负责对县令的考课,后者负责对刺史的考课,这种逐级考课的方式完全符合唐朝考课制度的规定,说明唐前期制定的考课制度的基本原则还是一直坚持下来了。

其三,负有监察司法审判之责。据《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载:“京师决死,莅以御史、金吾,在外则上佐,余皆判官莅之。”判官莅临决死刑场,与御史一样,都是以监刑官的身份出现的,如罪犯喊冤,则由其呈报并停刑再审。判官不仅负有监刑之责,还负有司法监察之责。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五月敕曰:“应天下所禁系罪人,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开发坟墓外,余并宜疏理释放。或信任人吏,多有生情系留,续察访得知,本道观察使判官、州府本曹官必加惩谴,以诫慢易。”<sup>①</sup>可知有关司法方面敕令的落实,依靠的是诸道判官等地方官员监督,然而这并非出于皇帝偶然的指令,实际上也是判官本身所具有的职能使然。比如唐文宗太和四年(830)九月,御史台奏曰:由于各地官员推勘刑狱,“有累月不申,兼频牒不报者,遂使刑狱淹恤”,请求“各得远近程限,及往复日数。限外经十日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等各罚三十直;如两度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罚五十直;如三度不报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罚一百直。如涉情故违敕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书下考”<sup>②</sup>。之所以要处罚判官,是因为其负有司法监察责任。关于判官行使监察刑狱权力的实例也是有的,如李方玄进士及第后,“裴谊奏署江西府判官。有大狱,论死者十余囚,方玄刺审其冤,悉平贷之”<sup>③</sup>。这一制度也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如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七月,大理卿魏迢奏请说:“诸道刑狱,恐有淹滞,望令本道判官一人,每月两度汇囚疏理。”<sup>④</sup>具体实例也是有的,如长兴四年(933),沧州节度使卢质“奏荐沧景观察判官靳诩,雪得冤狱,乞行恩奖”<sup>⑤</sup>。正因为两使判官具有这样的职能,故唐人李观在《浙西观察判官厅壁记》一文写道:李公士为观察判官,在浙西任职“十有余年,……多辨疑狱,多释冤囚,疑似得昭,纠纷得宁,四方翕然”,又曰:“公乘轺车,日往月还,剖断善恶,明白可观,六州之士,为颂作歌,天下名贤,罕不咨嗟。”<sup>⑥</sup>可见监察司法,昭雪冤狱,是判官的主要职责之一。

正因为判官负有这样的职责,所以在唐五代时期甚至委派判官直接参与审案,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如杜兼的从弟杜羔与其母早年失散,“及(杜)兼为泽潞判官,鞠狱,有媼辨对不凡,乃羔母,因得奉养”<sup>⑦</sup>。会昌中,江都尉吴湘受赃,“李绅令观察判官魏劬鞠之,赃状明白,伏法”<sup>⑧</sup>。因为两使判官多直接参与司法案件的审理,唐政府在元和三年(808)正月颁敕规定:“今后应坐赃及他罪当赎者,诸道委观察判官一人专勾当。”<sup>⑨</sup>到了五代时期,两使判官参与司法审案便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后唐天成(926—930)中规定:“应所禁囚徒,不许(论)州县厢县,大小刑狱。委观察使、刺史慎选清强判官一员,于本厅每月二十六日两衙引问,明置狱状,细述事端。大则尽理推寻,小则立限决遣。”<sup>⑩</sup>类似的史料还很多,如后汉苏逢吉“在河东幕府,帝尝令静狱以祈福,逢吉尽杀狱囚还报”。胡三省注曰:“谓为河东节度判官时也。”<sup>⑪</sup>后汉“乾祐二年十二月,邓州节度判官史在德弃市。以其误断民崔彦等八人,犯牛皮禁罪,皆至死刑故也”<sup>⑫</sup>。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月,同州节度判官刘震,

①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第677页。

②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上》,第1230页。另据《册府元龟》卷六一三《刑法部·定律令五》载,唐武宗即位之始,也颁布类似的敕令,可见以判官监察司法是唐朝一贯的制度。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二《李邕传》附《李方玄传》,第5004—5005页。

④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二〇《卿监部·举职》,第7462页。

⑤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七〇〇《牧守部·贪黩》,第8355页。

⑥ 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八〇三,第4245页。

⑦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传》附《杜羔传》,第5205页。

⑧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七三《吴汝纳传》,第4501页。

⑨ 王溥:《唐会要》卷四十《定赃估》,第851页。

⑩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八三九魏迢《申请慎勘囚徒奏》,第3913页。

⑪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闰七月”,第9374页。

⑫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一六《刑法部·议谏三》,第7412页。

“断杀里人康重等,其亲属诉冤”云云<sup>①</sup>。这些都是判官直接负责审案的例子。

尽管如此,五代时期两使判官的监察之责并没有丧失,这一点从下面的史料中可以得到证实。天成三年(928)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昇因隐匿母丧,被后唐明宗下令处死,并同时颁敕曰:“观察使、观察判官、录事参军,失其纠察,各有殿罚。”<sup>②</sup>这些官员之所以被处罚,显然是因为没有尽到监察之责的缘故。

其四,负有财政方面的监察之责。首先是对赋税征收的监察。唐朝实行两税法时明确规定除两税之外,其他税负全部免除,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各种杂税科配层出不穷,于是朝廷多次下令命诸道判官加强监察。如唐文宗于太和三年、七年连续颁布禁令,“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惩戒,长吏奏听进止”<sup>③</sup>。然而收效甚微。其次,命判官加强对本道财务开支的勾检。唐后期实行两税三分,留州部分虽归地方使用,仍必须接受中央比部的审计,每年要将开支情况及剩余钱物的账目呈报比部,“每(年)限五月三十日都结奏。旨下之后,更送户部。若违限及隐漏不申,录事参军及本判官并牒吏部使阙”<sup>④</sup>。再次,负有监察当地官吏俸禄发放之责。唐制,地方官吏的俸禄从当地财政收入中开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致使财政收入不平衡的情况比较严重,于是中央户部有时会给一些地区补贴一定数额的钱物,以维持俸禄的发放。如元和六年(812)、七年(813)连续向河东、凤翔、鄜坊、邠州、易定等道支給料钱共62500贯,却被观察使另作他用。于是在会昌元年(841)“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诸道并委观察判官专判此案,随月加给官人,不得别将破用,如有违越,观察判官远贬,观察使奏取进止”<sup>⑤</sup>。之所以命判官专判,就是为了发挥其监察职责,以便对观察使的权力有所制约。常平仓的主要作用在于调节物价,有时也用于救济贫民或灾荒。诸道的常平仓通常委判官专管,所谓“旧常平钱粟,并委本道判官勾当处置,使敛散及时,务以矜恤”<sup>⑥</sup>。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下来,唐文宗太和九年(835),“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sup>⑦</sup>。

除了以上这些财政方面的事务外,还有不少与财税有关的事务也由判官负责,比如私盐的查禁。唐朝自德宗以来,由于削藩战争的缘故,财政开支紧张,遂进一步加强了对私盐的查禁。除了严刑惩处私贩者外,还规定:“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目的就在于督促这些官员尽心于此事。到了文宗开成(836—840)末,又“诏私盐月再犯者,易县令,罚刺史俸;十犯,则罚观察、判官课料”。唐宣宗即位后,“茶、盐之法益密,榷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sup>⑧</sup>。可以明显地看出,对负责查禁私盐官员的处罚力度是越来越大了。

唐朝政府对民间余粮实行和籴政策,本来是为了解决政府储粮不足的问题,在客观上也具有平抑粮价的作用,不至于因谷贱而伤农。然而各地政府急需粮食时,往往会强行和籴,丰年或粮食不缺时,却拒绝和籴,从而伤害了农民的利益。所以朝廷经常下令禁止地方政府擅自和籴,并命御史台严加察访,然效果并不明显,于是便在唐后期委派诸道判官和录事参军负责此事,规定“每道委观察判官,每州委录事参军勾当,逐月具申和籴事由申台”<sup>⑨</sup>。即假如要和籴,必须要把具体理由申报御史台。

遇到灾荒时,朝廷如从异地调运粮食救济,由于路途遥远,耗费时日,往往难以及时救灾。如宪宗

①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一七《刑法部·正直》,第7423页。又据同书卷一五〇《帝王部·宽刑》载,时在广顺二年九月,第1818页。

②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五四《帝王部·明罚三》,第6092页。

③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第2129页。

④ 王溥:《唐会要》卷五十九《比部员外郎》,第1219页。

⑤ 王溥:《唐会要》卷九十二《内外官料钱下》,第1979页。另据《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载,是在会昌二年。然《册府元龟》卷五〇八《邦计部·俸禄第四》等书亦载为会昌元年,故当以此年为是。

⑥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〇五《宇文融传》,第3220页。

⑦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二》,第1361页。

⑧ 以上均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第1380页。

⑨ 王溥:《唐会要》卷九十《和籴》,第1952页。

元和(806—820)初,江淮饥荒,朝廷调江西、湖南等道米,数额达70至100万石,“往返数千里,五六个月舟船方到。百姓殍殍相望,转徙沟壑”。于是经李绛奏请,令就近收贮,规定“如是观察州,即令观察判官一人专知判,诸州即录事参军专知判。如有迁转改易,分明交付后人”<sup>①</sup>。唐代后期,甚至连军费的支出也都要判官参与,所谓“春冬给衣,及每月粮米,并须当时分付。如依前克拆,本判官、本将并重加贬责,长吏别议处分”<sup>②</sup>。之所以要求判官参与,就是要发挥其监察作用,杜绝或减少诸将的克扣和折给行为。

其五,其他方面的监察。在唐后期两使判官监察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地方事务的各个方面,比如馆驿邮传本来有专使负责,御史台派人监察,可是在元和五年(810)正月,考功奏:“诸道节度使、观察等使,各选清强判官一人,专知邮驿。如一周年无违犯,与上考。如有违越,书下考者。……仍请永为常式。敕旨:依奏。”<sup>③</sup>实际上判官负责只是监察馆驿之务,具体事务则有驿官管理。

户口的增减本是各地长官的责任,然而监察之责却在诸道判官。据孙元《大唐铜山禅师信行和尚兰若记》载:“贞元十三年春,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博陵崔公行府幕郎官判官李公臻巡户口,兼封闭诸山兰若。”<sup>④</sup>可知检查诸州户口增减也是判官的职责之一。其实早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时,就规定:“自今以后应造籍,宜令州县长令、录事参军,审加勘覆。更有疏遗者,委所司具本判官及官长等名品录奏。”<sup>⑤</sup>如有疏漏为什么要将判官的名品上报朝廷呢?原因就在于其负有监察勘核之责。会昌六年(846)敕曰:“大郡走失七百户以上,小郡走失五百户以上者,三年不得录用,兼不得更与治民官。增加一千户以上者,超资迁改。仍令观察使审勘,诣实闻奏。如涉虚妄,本判官重加贬责。”<sup>⑥</sup>从“如涉虚妄”则处罚判官一句,可知直到此时判官在这方面仍负有监察之责。

在唐代凡朝廷颁布的诏敕,在各地实施时往往都依靠判官检查落实。唐文宗曾规定严禁生产“纂组文采”、华美难得之物,要求天下州府“敕到后一月日内,所有此色机杼,一切焚弃讫闻奏。并委观察判官严加检察,犯者以故违敕论”<sup>⑦</sup>。再如唐懿宗颁敕规定每年三月一日至五月末“不许采捕水虫禽鸟”,但“虽有敕禁,尚恐因循”,于是便命天下长吏“差清强判官专勾当,切更分明检举”<sup>⑧</sup>。至五代时期仍是如此,如后唐明宗时部分地区发生了旱灾,“河中、同、华、耀、陕、青、齐、淄、绛、莱等州各申灾旱损田处,已令本道判官检行,不取额定顷亩。如保内人户逃移,不得均摊抵纳本户租税”<sup>⑨</sup>。

综上所述,可知使府内部的监察均由两使判官负责。此外,判官还要负责监察下属诸州,这一点史籍中也是有明确记载的,如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九月,滑亳节度使令狐彰“使节度判官姚爽按行颍州”<sup>⑩</sup>,便是一例。正因为判官职事如此重要,所以唐人对其十分重视,认为“谋而济美,佐而成能,必求贤者,礼而居之;无则阙如,不苟其人”<sup>⑪</sup>。可见对两使判官的素质要求之高,宁缺勿滥。

### 三、孔目官的设置及职能

唐朝的中书门下、集贤院、太常寺、宗正寺、吏部、神策军、清望官四品以上以及地方道、州一级政府中大都置有孔目官,其机构则称司,也有称院或房的。关于孔目官的人数,史书中只说集贤院置一员、神策军二员,诸道员数未见明确记载,从诸书零星的记载看,很可能每道仅置一员。由于孔目司

①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六四五李绛《论户部阙官斛斗疏》,第2895页。

② 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四三〇《大中元年正月十七日敕文》,第2179页。

③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一《馆驿使》,第1250—1251页。

④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八三九,第3915页。

⑤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户籍》,第5811页。

⑥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九《刺史下》,第1432页。

⑦ 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四二八《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敕文》,第2168页。

⑧ 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四四一《疏理囚徒量移左降官等德音》,第2232页。

⑨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一〇六后唐明宗《以灾旱蠲贷制》,第477页。

⑩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三年九月”,第7203页。

⑪ 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八〇三李观《浙西观察判官厅壁记》,第4245页。



(院)所掌事务繁杂,故孔目官的下属人员比其他诸曹要多一些。《文苑英华》卷八〇六收有蔡词立所撰的《虔州孔目院食堂记》,食堂,即所谓公厨也,其中写道:“亦非唯食为谋,所以因食而集,评议公事者也。”既然在进食时还要商议公事,可见人数不少。这还是州一级的设置,使府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一些。“孔目”一词本指文案目录,《史通·内篇·题目》说:“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烦碎之至。”至唐代始用来作为掌管文案的官名,在使府中孔目官的地位要比判官低,也是使府中的重要职官之一。陈岷在闽“初事太祖为孔目吏”,由于善于聚财,“由是得宠迁支计官”<sup>①</sup>。孔谦在魏博任孔目官,由于供军无缺,被晋王李存勖提拔为支度使<sup>②</sup>。说明直到唐末五代时期,孔目官的地位仍低于支计官、支度使,更何况两使判官了。

关于孔目官的职能,胡三省说:“唐藩镇吏职,使院有孔目官,军府事无细大皆经其手,言一孔一目,无不综理也。”<sup>③</sup>这种说法比较笼统,似乎使府之事无所不管。他在另一处说道:“孔目官,衙前吏职也,唐世始有此名;言凡使司之事,一孔一目,皆须经由其手也。”<sup>④</sup>仍然比较含糊,且“衙前吏职”的说法也不全对。前面提到的《虔州孔目院食堂记》一文,对孔目院所掌事务有具体记载,录之如下:

京百司至于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则有公厨,亦非唯食为谋,所以因食而集,评议公事者也。繇是凡在厥位,得不遵礼法举职司,事有疑,狱有冤,化未洽,弊未去,有善未彰,有恶未除,皆得以议之,然后可以闻于太守矣。冀乎小庇生灵,以酬寸禄,岂可食饱而退,群居偶语而已。况虔居江岭,地扼咽喉,有兵车之繁,赋役之重。苟一物为害,则万姓何辜;一纲不提,则七邑何守!同舍诸公,得无属意焉?小子承乏,每惭尸素,志求短拙,忧心忘食。或有公事之稽留,狱讼之冤滞,六曹之臧否,百姓之惨舒,农桑之失时,乡间之蠹弊,闻见所未及,才智所未臻,希会饬以言之,共裨风化。<sup>⑤</sup>

此文撰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五月三日,所述的虽然是州级孔目院的职能,然亦能反映其上属机构的职能情况。从此文看,孔目院对当地行政、赋役、军事、司法、生产、教化等,无不商议讨论。从“或有公事之稽留,狱讼之冤滞,六曹之臧否”等语看,其还负有对本地官吏的监察之责。如是这样,其职能岂不与判官的职能重复了吗?因此仅凭此文的记载仍不足以搞清唐代孔目官的职能情况。

实际上孔目官所经手的只是各种文案而已,并非具体政事的处理。关于这一点,唐人所撰《孔目判》有明确的记载:“案牘填委,簿领殷繁,剖析是凭,准绳斯在,事资孔目,以备阙遗。”<sup>⑥</sup>在其经手各种文案之时,并非仅仅收发和保管而已,而是要进行勾稽和核查。由于唐代相关史料较少,宋承唐制,可以从中搜寻一些有用的史料。据宋人洪迈说:“翰苑有孔目吏,每学士制草出,必据案细读,疑误辄告。”<sup>⑦</sup>连翰林学士提草的制敕其都要仔细核查,更不要说其他文案了。宋代其他部门的孔目官也都负有这样的责任,如“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安燾代吕嘉问详定闲冗文字”<sup>⑧</sup>。“详定闲冗文字”一句将其职能说得十分清楚。对于地方政府的孔目官来说,职能亦是如此,只是掌管文案比较复杂罢了。如宋太祖开宝元年(968)五月甲午,“诏诸道州府追属县租,以籍付孔目官,擅自督摄逋赋,因缘欺诈,破扰吾民,自今令录事参军躬按文簿,本判官振举之”<sup>⑨</sup>。可见孔目官掌管的只是簿书等文案,真正负责监察任务的却是判官,录事参军负责对文案的勾稽。孔目官除了负责检详文案文字外,当然还要负责文案的受付,如不尽职,将会受到处罚,如宋神宗时,“诏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公事范纯粹,太子中允、检正孔目房公事马琬,各罚铜六斤”。其中马琬被处罚的原因是

①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八《闽·陈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0页。

②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六《孔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0页。

③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胡三省注,第7357页。

④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十载二月”胡三省注,第6905页。

⑤ 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八〇六,第4263页。

⑥ 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五四九,第2804页。

⑦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京师老吏》,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2页。

⑧ 李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九“熙宁九年十二月辛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832页。

⑨ 李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五月甲午”,第202页。

“琬坐不承受文字也”<sup>①</sup>。唐代孔目官的职能亦是如此,正如《孔目判》所说:“众务条流,须施孔目,凭之以提纲纪,藉之以恤机衡。”<sup>②</sup>从“凭之以提纲纪”一句,可知其所掌管的文书公案可以用来检核官吏工作情况,发挥提振纲纪的作用,而不是由孔目官直接对官吏进行监察。唐人在记述一些优秀的孔目官时,也只是说:“权充本州孔目判官,吏不敢欺,人乐其业。”这里是指郑玉<sup>③</sup>。所说的“吏不敢欺”,也仅是指其精通文案,诸曹吏无法作弊而已。

从上引《虔州孔目院食堂记》所记的“有善未彰,有恶未除,皆得以议之,然后可以闻于太守”等句看,唐代的孔目官在掌管并检核文案时,如发现政事有不当之处,有责任报告当地长官,而不是自行处理,这就说明孔目官负有勾稽文案的职责。唐人常袞所撰的《授王幹等太子左赞善大夫制》中提到为王幹提升官职的原因时,写道:“贞以干事,敏于在公,掌戎门之条目,精详著称;董方州之财赋,底慎惟勤。”<sup>④</sup>王幹时任福建节度孔目官。制文中仅提到孔目官所掌的诸多文案中的两类,即军事文书与财税文案,可见这两类事务最为重要,其中尤以后者为重。从笔者所搜集的史料看,亦是如此。如韩滉大赏诸军,“夜问孔目吏曰:‘今日所费多少?’责谏颇细”<sup>⑤</sup>。韩滉之所以问孔目官,原因就在于其掌管着财赋簿籍。楚国马希范“用孔目官周陟议,令常税之外,大县贡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无米者输布帛”<sup>⑥</sup>。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七月制曰:如果两税征收亏欠,“县令、主簿罚一百直,勒停;录事参军、本曹官罚七十直,殿两选;孔目官罚七十直,降职……”<sup>⑦</sup>。处罚县令、本曹官(指户曹参军),是因为其是主管官员;处罚县主簿、录事参军及孔目官,则是因为其负有勾稽或监察之责。上面提到的孔谦、陈岷等人,也都是因为具有理财之能,从而在孔目官任上被重用的。关于孔目官的设置及其职能,在敦煌吐鲁番及一些西域出土的文书中亦有所反映,结合史籍记载,可知其还掌管印历、勘印、省署抄目等事,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兹不赘述<sup>⑧</sup>。

从相关史料的记载看,唐五代时期孔目官参与军政事务的现象颇多,或干预刑狱,或参议军事,或奉命出使,这一切均非其本身职能所规定,而是其长官出于对其信任,有意委派或者主动征询其意见。有些论者不加区分,将这一切均视为孔目官本身所具有的职能,是欠妥的<sup>⑨</sup>。后周太祖郭威曾颁布一道敕令,规定地方官员必须及时赴任,如果违程而没有及时申报吏部的,“罪在本判官、录事参军、孔目官已下”<sup>⑩</sup>。判官与录事参军负有监察之责,自然应追究其责任,而孔目官之所以被追究,是因为官员到任日月的公文是通过孔目司呈报的,故其负有没有及时呈报的责任。从这一角度看,孔目官的职能中确有一定的监察性质。

总之,在藩镇使府中,两使判官的职责重在监察,而孔目官的职责重在勾稽文案。

#### 四、结 语

杜佑说:“参军后汉末置,参诸府军事,若今节度判官也。”<sup>⑪</sup>可见判官一职的设置,历史悠久,然官名及职能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唐代,两使判官往往还领、摄州刺史,如“关播,大历中,以淮南判官摄滁州刺史。为政清静简惠,既无盗贼,人甚安悦之”<sup>⑫</sup>,又如“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常以判官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六“熙宁八年七月辛巳”,第6530页。

② 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五四九,第2804页。

③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九九三阙名《莫州唐兴军都虞候兼押衙试鸿胪卿郑府君玉墓志》,第4565页。

④ 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四〇四,第2052页。

⑤ 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7页。

⑥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八三“晋高祖天福八年十二月”,第9259页。

⑦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四八八《邦计部·赋税二》,第5842页。

⑧ 李锦绣:《隋唐审计史略》,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年,第206页。

⑨ 赵丹:《试析唐五代藩镇孔目官的职能》,《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6期。

⑩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三四《铨选部·条制六》,第7605页。

⑪ 杜佑:《通典》卷四十《职官典二二》,第1108页。

⑫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八〇《牧守部·静理》,第8125页。

摄事”<sup>①</sup>。判官也有正式拜为刺史的,如王绍懿就以深州刺史兼成德节度判官<sup>②</sup>。至于从两使判官任上升为刺史的情况就更多了,恕不一一列举。长官死后,往往也由判官代领其职,如“刘赞死于宣州,严绶为判官,倾军府资用进奉。无几,拜刑部员外郎。天下判官进奉,自绶始也”<sup>③</sup>。这一点前面也曾论及,可见判官地位之高,权力之重。

至于孔目官的地位问题,以往的研究看法不一。有人说其“与录事参军之职为近,疑为录事参军之属吏”<sup>④</sup>。也有人认为孔目官为市内之“税务部门”或“类似于今日之文书官”<sup>⑤</sup>。众所周知,录事参军在地方仅置于州府一级,使府是不置此官的,孔目官如何能够成为其属吏呢?至于认为孔目官为市内“税务部门”或“文书官”,更是不值一驳。李锦绣在《隋唐审计史略》一书中列举了唐五代时期形形色色的孔目官,其中有上司内外都孔目官、开拆书状孔目官、书状孔目官、都勾押孔目官、军事孔目官、鼓铸都勾孔目官、读示孔目官、厅勾孔目官、表奏孔目官、鼓铸孔目官、孔目典等<sup>⑥</sup>,加上前面所提到过的孔目判官,说明孔目官的人数是比较多的。可以肯定诸道的孔目官人数是不一致的,往往根据当地所涉事务而置,比如有些地区没有矿产资源,就没有必要设置鼓铸孔目官了。所有这些孔目官应该均隶属于孔目司(院),以其中一人为其长,至于其官名如何称呼,尚不得确知,推测内外都孔目官或者都勾押孔目官很可能是其长官,在宋代很可能称检正孔目房公事。孔目司(院)之长肯定不是胥吏,而应是官,在上面所提到的众多有关孔目官的史料中都提到其所摄、所试、所检校的官职,从而可以证明这个问题。至于孔目司(院)所属之众多孔目官,大都应是官,因为上引李锦绣之书中所提到这些孔目官,大都带有“节度散兵马使”、“管内诸司都勾押”、“随使押衙”等使府僚佐官衔,说明其身份已不再是胥吏了。在中央诸司中,还有为孔目官减选的记载<sup>⑦</sup>,也说明其不是胥吏。但是也不排除其中有胥吏存在,如“(汤)铢为中书小胥,其所掌谓之孔目房”<sup>⑧</sup>。总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孔目司(院)之长为职官则应无疑问。

需要说明的是,在唐代的使府中,监军使的角色值得注意。唐前期多以御史监军,事罢即废,唐后期在藩镇使府中均置有监军使,由宦官充任,遂成为一种固定的使职。监军使代表皇帝监军,监视的主要对象是节帅,所谓“外则监护统帅,镇静邦家”<sup>⑨</sup>。实际上监军使在使府内还是发挥了很重要的监察作用,所谓“监视刑赏,奏察违谬”<sup>⑩</sup>。有时皇帝也会责成监军使直接监察庶务,如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正月规定“便糴货收钱,入冬却余,仍委本道监使,常加访察;如有上下蒙蔽欺隐,破除闻奏”云云<sup>⑪</sup>。不过监军使的设置,主要是针对节帅,并非普通的监察官员。观察使虽为使府行政长官,但由于其是从唐前期的采访等使演变而来的,故仍具有监察职能,所谓“如郡守不理,或临财不廉,酒食是营,狱讼糜息,以时奏劾”<sup>⑫</sup>。不过,观察使毕竟已成为封疆大吏,有大量的军政事务需要处理,因此使府内部及对支郡的监察更多地还要靠判官、孔目等官执行。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①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武宗会昌三年八月”,第7991页。

②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第637页。

③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第2088页。

④ 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唐史研究丛稿》,第203页。

⑤ 王珍仁、刘广堂:《新疆出土的“孔目司”公牒析——兼谈大谷探险队与旅顺博物馆之西域文物》,《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物研究文集》,日本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西域研究会,1993年,第23—31页。

⑥ 李锦绣:《隋唐审计史略》,第205—212页。

⑦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五《宗正寺》,第1351页。

⑧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三一七《宰辅部·正直二》,第3751页。

⑨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七三〇苏遇《忠武军监军使……朱公神道碑并序》,第3335页。

⑩ 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二《京城诸军》,第1535页。

⑪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二《乾符二年南郊赦》,第367页。

⑫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六《咸通七年大赦文》,第444页。

tus.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was neither slavery nor feudal society. Maybe we could generalize it as the “*Bumin* (freemen to the patriarchal clan commune) society” put forward by Lei Haizong.

#### **On the Internal Supervisory System of Military Government Office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Du Wenyu

Besides the emperors and the Censorate (*Yushi Tai*) dispatching censors and officials to patrol all around the country, local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also set up interior officials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supervision. Within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fices, there wer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Jiedu Panguan*) and Observation Assistant (*Guancha Panguan*), which were collectively called the Two Assistants (*Liangshi Panguan*), and moreover, the Clerk in Charge of Files (*Kongmu Guan*), thus forming an integrated internal supervisory system. The division of those two posts was that the former mainly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supervisory affairs, and the latter wa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to accomplish the purpose of supervising the government affairs.

#### **On the Influence of “Setting up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Annam”**

##### **in the Reign of Yongle to “Zheng He’s Treasure Voyages”**

Yang Yongkang, Zhang Jiawei

In the reign of Yongle, Zhu Di, the Chengzhu of Ming declared war on Annam and set up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here under his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setting up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Annam” was to deter the vassal states i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and “Zheng He’s treasure voyages” aimed at deterring the vassal states on the islands. Those combined routes over both land and water caused a situation of converging attack, and formed enormous military pressure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especially over the region of South China Sea. After setting up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Annam, the Ming Dynasty controlled the range from the Champa Kingdom to Malacca by road,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to the treasure voyages to the Western seas, and the tributary system was then established and strengthened smoothly. Till the succession of Emperor Xuanzong of Ming, the suppression of Le Loi was weak, and the army of the Ming Dynasty withdrew from Cochinchina after a debacle, the prestig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n suffered badly, and China lost its geographical advantag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pset that the vassal states neglected to present tributes, Emperor Xuanzong sent Zheng He to the seventh voyage to remedy the situation. After the reign of Xuande, Annam grew strong, so the tributary system in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n Ocean region conducted by Zhu Di tended to disintegrate, and the suzerain posi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became defunct. “Setting up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Annam” laid foundation for the Ming Dynasty controlling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and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around the region. That decision-making of Zhu Di had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reasure voyages, while the Emperor Xuanzong “abandoned Cochinchina” was just a precursor to the collapse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 **A Study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of North China**

Hu Weiying

As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at the end of 1941, the existence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areas started to face severe challenges. Established in 1942, the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of North China was the highest leading body of Christian churches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area of North China. Viewing from its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Japan implemented the agent mechanism, a political model common in colonies. Politically, Japan supervised and consolidated Christianity through the puppet Government Affairs Committee of North China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and on the administration, Japan directly controlled the churches and branches through Japanese special committeemen and indigenous church leaders. The goal set for the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of North China was to cooperate with Japan’s war of idea, and exert strong control, which was quite direct and rough. But in order to reach the goal, the discourse system built by Japan was fairly